

张祖道，用镜头诠释社会学的真谛

袁帆

2026年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迎来百年华诞。社会学系是1926年清华学校设立的大学部第一批学系之一，在百年来培养的优秀毕业生中，有一位学子以自己独特的社会学自觉，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影像，成为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之一，他就是张祖道。

若要简要了解张祖道的事迹，不妨先来品鉴下面的这段人物评价：

“1940年代考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，社会学的训练和背景奠定了张祖道一生摄影的基调。他在革命时期随军转战南北，和平时期进入媒体继续从事报道工作。他带着学者的思考，以文化自觉的态度记录下丰富的人文世界。1940年代清华园的校园生活和北平天桥的街头艺人，随潘光旦、费孝通学术调查拍摄的社会学、人类学、民族学文献，以及众多的文化名人影像，都是中国摄影史上的珍品。他是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。”

“清华”“社会学”“纪实摄影”“先行者”这几个关键词，可以勾勒出“张祖道”的大致轮廓。这段出自2012年的“颁奖词”，对应着张祖道获得



TH351 清华“反饥饿反内战”游行队伍通过东四牌楼 张祖道北平1947.5.20

1947年清华“反饥饿反内战”游行队伍（注释系张祖道手迹）



张祖道（1922-2014），湖南浏阳人。1945年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，师从潘光旦、费孝通。1949年参军，1952年任《新观察》杂志摄影记者，1954年随费孝通赴内蒙古草原考察，1956年参与潘光旦鄂川土家族识别调查，42年间五次随费孝通考察江苏“江村”，系统记录农村社会变迁。历任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摄影》等刊物摄影记者、编辑，1985年当选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。其摄影实践与社会学研究结合，出版《江村纪事》《1956，潘光旦调查行脚》等著作，留存大量20世纪中国社会影像。2012年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。

的“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——终身成就奖”，那一年，他90岁，距离他的人生终点还有两年。

纪实摄影之路始于清华园

张祖道，1922年2月7日出生在湖南浏阳东乡的一个小山村。那个时代的湖南农村普遍贫穷，但外部世界的新鲜“玩意儿”却没有被阻隔不入，小集镇里居然也有了简陋的照相馆。一次难得的照相经历激起张祖道幼小心灵里的好奇。他看到：照相师傅把头钻进一面红一面黑的大方布罩，在里面鼓捣几下又钻出来，一边嘴里叫着“坐好、别动”，一边把相机前的圆盖取下，手臂优美地一忽悠，马上又盖上圆盖，就算照完了。于是张祖道也“一直很想学他照出人影来”。那时谁也没有想到，后来他不但照出了人影，还成为一位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。

1945年，23岁的张祖道考入“西南联大”，他的学费是靠近两年时间打工才攒足的。在昆明的一年“联大”生活，让他经历了抗战胜利前后发生在



北平天桥街头一景：拉洋片（1947年）



1947年四位教育家合影（注释系张祖道手迹）



潘光旦在湘西调查识别土家族（1956年）

这座“民主堡垒”内外的一系列历史事件。随着抗战胜利复员，西南联大重新分为“北大、清华、南开”三校，他因此在1946年11月进入清华园，成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。

1947年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已经有21年历史，任课的教授都是中国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，每个人都有着极深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社会调查经验。学生在四年中学习的课程包括27门必修课，18门选修课，学习负担着实不轻。张祖道幸运地从潘光旦、陈达、费孝通等大师那里学到了现代社会学理论、体会到了认识社会、改造社会必须要具备“知行合一”精神。“摄影”并不在社会学系的课程中，但张祖道却悟出了影像对研究社会的意义，从年幼时就有的“摄影梦”就这样被唤醒，他首先想拥有一架自己的照相机！

张祖道不是富家子弟，根本买不起新的照相机。好在他从昆明“复员”到北平的途中，曾跟随陈达教授进行过三个月的“上海工厂和劳工状况调查”，他用积攒的劳动报酬到北平“东安市场”上淘到一架韦尔塔（Welta）牌德国老相机。这架构造简单的二手货对于当时的热血青年而言，那就等同于战斗的武器。那几年，他拍得最多的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，几乎所有的游行他都留下了记录。

与此同时，张祖道和另外两位同学孙同丰、朱世铨组成了“清华周末摄影社”，他们拍摄学生的学习与生活，也靠出售校园风景照片作为拍摄成本的补贴。摄影还是张祖道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的唯一渠道，在学校那几年里，他“从没有向家里要过一

文钱”。

在社会调查实习课中，张祖道凭借自己的相机，拍摄了诸如“天桥杂耍”“厂甸庙会”“聋哑学校”等一系列反映社会现状、民俗民风的纪实照片，不仅为完成课程报告增添了独有的图像，更是为后人留下了“老北京”的珍贵绝影。鲜为人知的是，他还曾经按照个别几位“特殊”同学的要求，秘密为他们拍摄了制作假“通行证”所需要的照片，解其“燃眉之急”，帮助他们顺利奔赴解放区。

我知道“张祖道”的名字，也是从一张拍摄于1947年4月27日的纪实照片开始。照片上，梅贻琦、胡适、黄钰生、查良钊等四位分别代表清华、北大、南开、昆明师范的著名教育家会聚一起，在清华园大礼堂后面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合影，成为我们今天深入了解近九年西南联大历史的“焦点”。而这正是张祖道瞅准转瞬即逝的时机，沉着拍摄成功的经典之作。

现在已经无法确认张祖道在那几年究竟拍摄了多少张照片。仅从清华大学档案馆保存的百余份校园照片看，那都是“清华园”不可多得的视觉档案，都已经成为清华校史中无法分割的部分。毫无疑问，清华社会学系是张祖道走上纪实摄影之路的出发之地，而他给清华园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，也让我们由衷赞叹：清华幸有张祖道！

跟随费孝通跨越半个世纪的社会调查

1949年3月，张祖道和212名清华同学一起穿



被称为“铁鎔”的江村四齿锄
(1957年)



身穿充满古风裙裤的江村农民
(1957年)

上军装，参加了第四野战军“南下工作团”。正是有了摄影的一技之长，他被选入中南军区《战士画报》社，成为一名军事摄影记者，从清华带来的小相机继续成为他手中的武器。张祖道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，仍然对那架旧相机“给我长脸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”心存感念。

1952年7月，张祖道调入北京《新观察》杂志社，成为当时社里唯一的摄影记者。那是一段让张祖道难忘的“激情燃烧岁月”，“跑新闻、赶任务”，忙得连星期天都很少休息，以他署名的摄影作品不断出现在新闻媒体上。在最初几年，他还多次受命跟随清华恩师潘光旦教授远赴湘西北、鄂西南、川东南采访识别土家族；跟随费孝通教授去呼伦贝尔大草原，对蒙古族牧民生活进行民族考察，按他自己的话说，是“扎扎实实地补上了一堂社会学田野调查课”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项跟随费孝通进行的“江村调查”摄影经历，不仅让张祖道在—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社会学实践中做出了卓越的摄影专业贡献，而且也铸就了一段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。

费孝通，江苏吴江人，著名社会科学家，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。他于1935年获得清华大学硕士学位，并考取公费留学资格。在出国之前，他对江苏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一次“农村经济和生活状况”调查。这次调查的资料也成为他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基础。这篇名为 *Peasant Life in China*（中文名《江村经济》）的论文，记录并分析了中国人在江



费孝通与沈宝法一起看两人21年前的老照片（1957年）

南农村原始状态下对生存发展方式的选择，为费孝通奠定了在世界人类学、社会学领域的地位，被其导师马林诺斯基（K. Malinowski）定义为“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”。古老的“开弦弓”也因此有了“江村”的现代学名，并作为观察中国农村的一个标本，从此长期为学界所关注。

让费孝通始料不及的是，他进行的“江村调查”，从1936年开始至2000年结束，总计进行了约30次，



周金发老太用废蚕丝捻棉线（1957年）

是一项跨越近65年的超长人类社会学调查工程，举世罕见，意义非凡。而张祖道有幸从1957年起伴随老师“五访江村”，用镜头持续记录了世界社会学调查史中的“费氏”经典案例，见证了“江村”作为中国江南农村的缩影所发生的时代演变，并为近现代中国如何解决“三农”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影像证据。

1957年5月，47岁的费孝通在相隔21年后带领一个调查组重回江村，在那里住了21天，重点考察社会体制和生产关系在历史产生重大变化后的农村状况。35岁的张祖道也第一次作为摄影记者去到江村。那次考察，费孝通除了要求他把所有类型的农具都拍摄下来以外，没有给他布置其它“作业”，全凭张祖道对社会调查的基本概念去捕捉感兴趣的场景。

于是在张祖道的镜头里，留下了依然保持着古老耕作模式的农民和工具，完全靠手工养蚕、缫丝的乡村“生丝经济链”，割草养兔补贴家用的农村儿童，还有保留着充满古风的“包袱”和“战裙”，靠烧柴草的“老虎灶”……当然，他也为费孝通抢拍了几张纪实照片。其中一张成为连接两次“江村调查”的历史写照，相片上的费孝通和一位叫“沈宝法”的农民在观看英文版《江村经济》的扉页，上面有两人在1936年的合影，而那时的沈宝法只有9岁。

张祖道在这次社会调查中拍摄的照片，是江村“图象志”里最接近1936年开弦弓村原始景象的影像，与费孝通撰写的调查报告内容天然合璧，十分恰当地传达了他对江村经济研究的思考和观察视角。调查结束后，费孝通为《新观察》撰写了《重访江村》（其一）（其二）两篇文章，分别发表在1957年6月11和12两期刊物上，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。

然而遗憾的是，一场“反右”斗争突如其来，费孝通被错划为“大右派”，《重访江村》的系列文章就此夭折，他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也被迫停止。

直到1981年10月，费孝通又重启被中断24年的“江村考察”。他迅速写下了著名的《三访江村》，将其作为在1981年度英国皇家学会“赫胥黎纪念奖”颁奖仪式上的获奖演讲词。文中一语道出“三访江村”的意义：“用开弦弓村作为一个观察中国农村变化的小窗口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有近五十年的比较资料”。而他倚重的“比较资料”中，张祖道1957年拍摄的那些照片无疑是最直观的影像物证。

此后费孝通明确要将江村当做长期进行农村调查的基地，不断研究它的变化与发展。1982年1月，费孝通四访江村，张祖道在25年后第二次跟随老师重回故地。费孝通语重心长地对同肖“戌狗”的张祖道说：“我已是70出头的人了，口袋里只有10块钱，也就是我只能再工作10年”，“你比我小一轮，你数数你的口袋，不是只剩下22块钱了么？好好地花，别浪费了。”此时刚满60岁的张祖道听到老师的教导，“头皮一紧，心里涌出一股紧迫感”。

费孝通在1957年就发现，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江南农村，仅仅依靠土地制度改革，“平均地权”“以粮为纲”显然不能解决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，那时他就提出了“因地制宜”发展乡村副业和工业的“富民”主张。这一次重访，张祖道看到了江村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发生的实质性变化，正是费孝通当年所希望达到的愿景。于是在他的镜头中，出现了集体发展蚕桑，家庭养羊、养兔，多种经营的欣欣向荣；出现了小型缫丝厂、丝织厂等乡镇企业的雏形。最可喜的是，农民在“农田、副业、工资”三方面都有了收入，生活改善，照片中的他们也露出了会心的笑脸。

再后来的1994年10月，张祖道第三次随老师访问江村时，开弦弓的缫丝厂已经扩建为现代化的企业。再再后来的1996年9月和1999年10月，他又随老师第四、第五次访问江村。那时，费孝通已经20余次访问江村，他当年口袋里的“10块钱”早已花光。但正是在这种无私的“透支”中间，费



北京市民在东交民巷迎接解放军（1949年2月）



《采摘果树新品种》（1958年）

孝通完成了“乡村调查、小城镇研究、贫困地区踏访、社会学重建”等等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人类社会学工程，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，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张祖道拍摄的纪实照片。

2021年2月25日，中国向全世界宣布：“经过八年持续奋斗，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，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，贫困县全部摘帽。”在这一人类“反贫史”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实践中，谁能说没有费孝通和张祖道进行“江村调查”作出的贡献？毫无疑问，江村是让张祖道在视觉人类社会学领域扬名立万的“福地”，但从另一角度来看，我们必须要说：江村幸有张祖道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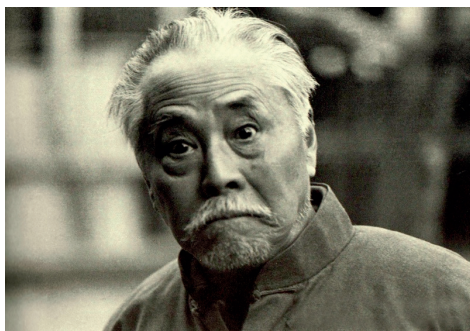
《刹那》摄下百余位“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”

在新中国第一代摄影家中，拥有清华社会学专业背景的，张祖道是唯一者。俗话说：“文如其人”。在张祖道用镜头书写的每篇精彩文章后面，似乎都隐藏着一双睿智的眼睛，而连接这双慧眼的是朴实的心灵和深邃的头脑。

在纪实类摄影作品中，表现宏大历史叙事的题材最能震撼人心。张祖

道在1949年2月3日拍摄的《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的队伍通过东交民巷》无疑是一幅上乘之作：东交民巷红旗招展，解放军的坦克迎面隆隆驶来、两旁市民敲锣打鼓，让人们感受到站起来的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欢欣鼓舞。在定格这一历史时刻的同时，张祖道也许想到了抗战中经历过的民族苦难，也许想到在“西南联大”学生运动中担任“纠察队长”所经历的民主抗争，也许更坚定了投身革命洪流的决心……因为在此一个月后，他就参军成为了一名军事摄影记者。

在张祖道的摄影生涯中，他的社会接触面非常广阔，镜头中出现最多的还是充满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百态人生。1958年秋天拍摄的《采摘果树新品种》，丰收农民脸上的喜悦让人过目不忘；1984年11月2日拍摄的一幅照片，画家叶浅予事出有因



怒 - 叶浅予（1984年）



《背铁矿石的农民》（1958年）

的“怒气”极具个性；1979年10月12日，镜头中的叶圣陶、夏衍、周扬一起出席追悼会，对故人逝去的“哀伤”之情令人泪目……

张祖道一生中拍摄了数不清的人物，其中著名的文化名人影像构成了一个独特系列。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于2009年出版了“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”珍藏集《刹那》，囊括了张祖道从1947年到2003年的半个多世纪里，为250余位文化艺术界名人留下的特写影像。其中包括：教育家胡适、梅贻琦；文学家田汉、巴金、曹禺、老舍；画家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张仃、黄永玉；表演艺术家梅兰芳、常香玉；还有雕塑家刘开渠与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家群体，以及建筑学家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，等等。

按照浅显的理解，好像纪实摄影就是“看见什么拍什么”。但在张祖道这里，我们却同样可以看到艺术性极强的纪实性作品。在一幅拍摄于1958年的《背铁矿石的农民》里，他镜头中那位农民除了任劳任怨的神情外，不但没有任何卑微的感觉，更有顶天立地的架势。以摄影常识想象，那是只有蹲下来才能拍到的画面。而正是这种“放低身段”的与人为善，让他拍出了许多充满艺术“人情味”的纪实作品。

在很长的时间里，张祖道的作品一直并不起眼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大名气。其实这恰恰反映出他“谦和低调”的性格特征，“老老实实做人，老老实实拍照”正是他一贯秉承的人生态度。他从来没有刻意地去追求“摄影家”的桂冠，只是老老实实，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拍摄之路上“趟道”，再加上追随社会学硕儒所得与自我精进提升的能力，这才是他留下如此之多经典之作的的原因。他也从来没有摆出一副“艺术家”的姿态对待自己的作品，而是将它们视作应该被共享的资料，无私地提供给他的同事们和所有需要的人。在青年同事们眼里，他就是一个“校对、翻拍、暗房、管理资料”样样活儿都积极去干的“老劳模”，是一位被大家亲切地直呼为“老道”的朋友与长者。

张祖道的与众不同，特别表现在他经过清华大

学社会学严格训练后养成的文献意识和严谨习惯。他为自己的拍摄工作和日常生活写下日记，为每张照片都留下详尽的文字资料。即便在岁月更迭中他丢失了大量照片和笔记，仅就现存的影像



2010年的张祖道

和文字资料对中国文化史而言，也已经是一笔巨大的文化历史财富。2003年以后，张祖道编著了《江村纪事》《1956，潘光旦调查行脚》《刹那》三本纪实体著作和摄影集，集中展现了他的摄影经历、经验和成果。毋庸讳言，是华夏大地孕育了张祖道，是中华文明造就了中国纪实摄影的一代先行者。而张祖道用一生的摄影实践，诠释了社会学的真谛在于“认识世界，造福人类”。凭此一点，我们完全可以说：中国幸有张祖道！

结语

在纪念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点，我特别想起张祖道说过，“生活就在你身边，一瞬间，它就是历史”；“摄影既可以远求，也可以近觅，东瞧西看，都是材料，不必发愁”。这些朴素话语体现了“大道至简”的人生智慧，也包含了“随遇而安”的从容心态。

摄影如此，生活亦然。张祖道是这样说，更是这样做。他用镜头捕捉了一个个历史的独特刹那，自己也伴随一幅幅传世之作被融化在永恒的刹那中，让后来的人们不断理解、持续效仿、永远纪念。🍷